

学习集

从社会学角度谈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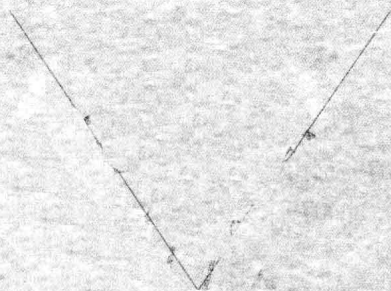
姜东赋 著 CONG SHEHUIXUE JIAODU
TAN WENXUE

學苑出版社

学习集

从社会学角度谈文学

姜东赋 著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习集：从社会学角度谈文学 / 姜东赋著. -- 北京：
学苑出版社，2012. 5

ISBN 978 - 7 - 5077 - 4029 - 5

I. ①学… II. ①姜…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 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10683 号

责任编辑：杨 雷

封面设计：艾博堂文化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100079

网 址：www. book001. com

电子信箱：xueyuan@ public. bta. net. cn

销售电话：010 - 67675512、67602949、67678944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厂：保定市彩虹艺雅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尺寸：710 × 980 1/16

印 张：16

字 数：260 千字

版 次：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0.00 元

目 录

上 编

3/文艺与生活

14/辞藻与内容

——学习《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笔记

26/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的文学批评

——学习马克思、恩格斯致拉萨尔的信

40/关于物质生产的发展同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及其他

51/文学艺术与时代

63/略说“社会意识形态不在上层建筑之外”及其他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第二版)“序论”读后

69/不要当“蹩脚的画家”

——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体系问题试谈

79/马克思:纯批判的态度

84/论文学艺术的再现与表现

98/略谈形象思维

105/试论所谓“内宇宙”

111/方法问题漫议

117/“形象大于思想”漫议

120/漫话“创作须情感”

123/创作方法是文艺界的特殊问题

127/这“距离”不是那“距离”

——谈马克思的文艺批评方法

131/谈文学的分类和体裁

——兼谈关于新文体论的建立

下 编

- 139/中国小说观的历史演进
152/略说中国近代小说理论的特点
159/谈晚清小说论坛上的论争
167/论梁启超的小说观
177/晚清四作家小说观平议
189/严复文艺观散论
——兼与周振甫先生商兑
200/现实性，民主性与感伤情绪
——对《聊斋志异》之外清代文言短篇小说的一点考察

附 录

- 211/王爱花《“延异”视野中的中西书写》
224/刘嘉元《汉字书写对朝鲜通信使的作用》
232/赵靖《浅析“燕岩体”产生的文化渊源》
245/许婉君《由甲午海战前的中国社会看晚清崇高观之扭曲》

上 编

文艺与生活

正是因为艺术再现“生活”，所以，关于艺术的正确学说，只有关于“生活”的正确学说产生以后，才能够确立在坚固的基础上面。

——普列汉诺夫

本文不是一篇严谨的论文，只是一束学习札记，松散一些，只好听之，故谓之“漫议”。话虽这么说，总不能是一盘散沙，把它们束在一起的，就是普列汉诺夫的上述思想。

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或曰文艺与现实、与社会、与时代、与环境的关系，是文艺学上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凡是谈文艺的，首先都会碰到这个问题，文艺学上其他问题的解决，跟如何回答这个根本问题，大有关系。对于文艺与生活的关系，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表述方式，比如社会状况决定着文艺的面貌，文艺是生活的反映，透过文艺可以看出社会的某些现象，研究文艺必须了解产生它的时代，等等。可以说，这些命题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文艺与现实的关系，提法不一，实质相通。

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也是文艺学上一个古老的问题。可以说，从文艺理论产生的时候起，人们只要谈文艺问题，就回避不了这个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对这个古老问题的解释，当然是最彻底、最科学的。但是，正如列宁所说：“人类思维按其本性是能够给我们提供并且正在提供由相对真理的总和所构成的绝对真理的。科学发展的每一阶段，都在给这个绝对真理的总和增添新的一粟”。真理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在承认马克思主义的产生给文艺学带来了

根本性的变革的同时，也不可否认，在此以前的一些杰出的古代理论家，曾分别为真理殿堂的建成添砖加瓦。普列汉诺夫的意思是说，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发现了人类社会生活发展的客观规律之后，完整的、彻底的、科学的艺术观才能出现。这话是深刻的。本文将要谈到的几位中外古代理论家，他们对于艺术的看法有正确的方面，也有致命的缺陷，其关键就在于他们对于生活本身的理解是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的。

比如，认为透过诗歌、音乐，可以看出产生它的社会的治与乱，即认为“声音之道，与政通矣”，^①这是中国古代艺术理论中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一个传统观点。这个观点，既有它正确、合理的一面，也有它错误、神秘的一面。

这个观点，最早大概见于《左传》。《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季札曾到鲁国“观乐”，说他当时由诗歌、音乐而看出列国之治乱兴衰。《礼记·乐记》和《毛诗序》里，都有这句话：“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认为原因在于“凡音之起，由入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那么，“物”是指什么呢？从上下文来看，这里显然是指社会的政治状况。几百年以后，大文艺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的《时序》里，依据这个传统观点，概括地叙述了自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一直到他生活的时代的政治变动情况，以及文艺随之而变化的过程，提出著名的“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观点。可见这个观点的影响有多么深远。

不能不承认，这个传统观点是了不起的。它看出了文艺作品的内容，是作者思想感情（人心）的表露，“人心之动”，则是“物”引起的、决定的；在所有的外“物”当中，这些古人突出地把社会的政治状况提取出来，认为这个领域对“人心”具有最关紧要的影响和决定作用，从而认为，“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这个见解系统，是相当深刻的，就是在今天，仍不失其一定意义，它正确地反映了某些客观情况。

但是，同时不能不指出，这个观点也有不彻底、不科学的一面。这里，仅以《时序》为例，加以证明。

① 《礼记·乐记》。

从《时序》看，刘勰对时代、政治的理解，仅仅停留在“德盛化钧”、“政阜民暇”，或“世积乱离”、“风衰俗怨”这样一些既成事实上面，而没有看到更本质的东西。对于造成这样的既定现实状况的原因，他认为在于每个时代最高统治者的作为、个性（所谓“王化”、“政教”）。他说：“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邶风》乐而不淫。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这就是说，刘勰认为根本原因在“上”，而不在“下”。在上者“德盛”或“化淳”，则歌谣“勤而不怨”，或“乐而不淫”，在上者“昏”或“微”，则文艺作品“怒”或“哀”。“风（按即风为教化之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这个结论，就足以暴露刘勰历史观的局限性。

我们不能苛求古人，要求他们具有今人的认识水平。但，我们也不能拿一些只适合于今人水平的大帽子（诸如“解决了文艺与现实、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等），硬戴到古人头上，把仅仅认识到部分真理、掌握了事物的初级本质的古人，说成是已经彻底揭示真理的伟大理论家。如果事情果真如此，那还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干什么？

再比如，关于评论文艺作品的方法，中国也是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有人提出不能就事论事，而必须“知人论世”的见解。这个见解是跟文艺与生活关系问题紧密相关的。这个见解，对后世产生了更为深远、巨大的影响。现在把它解剖一下，同样会发现它含有宝贵的真理因素，也存在致命的缺陷，病根同样存在于普列汉诺夫所提出的那个问题上——对于“世”的理解不科学。

首先提出“知人论世”见解的，是孟子。他说“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①他认为，读《诗》的时候，要了解作者的状况和他写作这首诗时的背景，然后，才有可能弄清它的真正意义。后世的人，对这个见解十分信服，以为舍此不足以言诗。20世纪初，深受西方近代美学思想熏陶的王国维，以他不同于中国旧式文人的新头脑、新眼光，回过头去看“知人论世”这个见解，不禁叹道：“善哉，孟子之言诗也！”他认为，用这个方法治诗，“则古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并且推而广之，说：“治古诗如是，治后

^① 《孟子·万章》。

世诗亦何独不然？”^①他对“知人论世”的治诗方法，十分推崇。

鲁迅先生对于“知人论世”也是肯定的。这不仅见于他在《“题未定”草》（之六，之七）里的言论，而且见于他在《中国小说史略》里的实践。他说：“世间有所谓‘就事论事’的办法，现在就诗论诗，或者也可以说是无碍的罢。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痴人说梦的”。鲁迅先生对“知人论世”进行了全面的诠释，把它和“就诗论诗”对立起来，认为它才是正确的论文的方法。在《中国小说史略》里，鲁迅先生从汉末到晋的政治黑暗情况，讲到《世说新语》一类记载名士清议作品的大量出现，从宋代都市生活的繁荣，讲到话本小说的产生；从中国社会的宗教变迁情况，讲到中国特多鬼神志怪小说的原因；从曹雪芹和高鹗个人生活际遇、思想心理的不同，讲到《石头记》前80回和后40回的出入。总之，鲁迅先生论小说，首先顾到作者和作者周围的情形，并以后者来说明前者。这可以证明，《中国小说史略》所使用的方法，是对中国传统的“知人论世”方法的继承和发展。

必须承认，“知人论世”这个中国传统的论文方法是了不起的。这个方法的提出，是建立在对文艺与现实关系问题的一定理解基础上的。这个方法在今天完全可以为我们继承下来。

但是，同时也必须指出，由于古人对于“世”的理解是不科学的，因而他们对于“知人论世”方法的解释和运用，也有不科学的一面。这里，大胆地以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为例，来说明之。

鲁迅先生对于“知人论世”的上述见解，当然不同于古人原有的认识，尤其是在晚年，鲁迅先生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对社会的认识已然达到科学水平，从而他对“知人论世”的解释，就跟我们的认识是一致的。但是，也不能不指出，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鲁迅先生在治中国小说史的时候，由于当时还不具完整的科学历史观，因而从这部小说史中看，他对于他所强调的“社会状态”的认识，还是笼统的，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有一定距离。这主要表现在这部小说史没有着力对各个时代的经济状况，以及直接由这一状

^① 《玉溪生诗年谱会笺序》。

况所决定的社会阶级斗争状况，进行深入研究，没有明确看出，归根结底，正是这些状况决定了中国小说内容、性质的演变。这是这部小说史的主要缺陷。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承认《中国小说史略》是中国最早一部比较好的小说专史，而不同意某些论者把它说成是中国迄今最好的一部小说史，并且是最好的一部唯物主义小说史的看法。不指出鲁迅先生早期思想上的局限性，不同时指出这部前期著作的局限性，也就等于局限了后人，使后人不再前进。

在国外，也是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和孟子大约同时）提出了“摹仿说”，认为文艺是对现实的摹仿；他还指出，文艺所摹仿的对象是“在行动中的人”；他还认为，文艺不仅摹仿现实世界的现象，而且摹仿现实世界的现实性和普遍性（见《诗学》罗念生中译本第2、7、28页）这无疑是一种宝贵的见解。他不仅指出文艺要反映现实，并且指出这不是照葫芦画瓢，而是对现实的深入认识，而且强调指出，“在行动中的人”是文艺反映的主要对象，看出了文艺的一些特点。

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在欧洲文艺思想史上，产生了巨大、深远影响。19世纪俄国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诗学》是第一篇最重要的美学论文，也是迄至前世纪末叶一切美学概念的依据”，“他的概念竟雄霸了二千余年（《论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事情确实如此，就是今天，亚里士多德的文艺摹仿说仍有启发意义，它所包含的真理因素，完全可以用来丰富我们的文艺思想。

但是，同时也应该看到，作为古代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对“现实”的理解，跟我们的认识是有天壤之别的。

首先，他认为奴隶只是“能说话的工具”，不是社会的成员；奴隶主才是“社会的动物”。据此，他当然把广大奴隶的生活排除在“现实”之外，认为它不是文艺摹仿的对象。他在《诗学》中说，只有那种声名显赫、生活幸福、出身高贵的“好人”，才能作悲剧的主人公。其次，亚里士多德认为，在客观世界向前运动的时候，存在着“第一推动力”。这也就是认为，现实的发展不完全是物质的自我运动，而有赖于神给它以推动。这种对“现实”的认识，跟我们的认识，当然是有天壤之别的。亚里士多德往往动摇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在这个“第一推动力”问题上，他又回到他的老师——古代最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拉图那里去了。总之，当我们今天复述亚里士多德的文艺摹仿

说的时候，切记他所说的“现实”跟我们所说的现实，是有原则区别的。不记住这一点，恐怕要犯原则上的错误。

如果说以上的分析是一种苛求的话，那么，必须申明，我们苛求的不是古人，而是今人。在文艺与现实关系问题上，泯灭古人与今人的思想界限，混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终究是欠妥当的。

给了亚里士多德崇高评价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他在《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著名学位论文中，继承并发展了文艺摹仿说。他说：“再现生活是艺术的一般性格的特点，是它的本质”；艺术作品常常还有另一个作用——说明生活，它们常常还有一个作用，“对生活现象下判断”。这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对文艺与现实关系问题的最好回答。关于这一结论的意义，那是人们所熟知的，这里不多说了。

普列汉诺夫正是在评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论文时，提出了本文刚开始时所引述的那个思想。他的原话是这样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正确地称艺术为‘生活’的再现。但是，正是因为艺术再现‘生活’，所以科学的美学，——更正确些说，关于艺术的正确学说，——只有当关于‘生活’的正确学说产生了的时候，才能够站立在坚实的基础上面”。并从这一思想出发，严肃指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见解仅仅只是正确的艺术观的萌芽”。我们认为这个意见是正确的、重要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人本主义者，他依据所谓人类学原理来解释生活，实际上就是用人性论的观点来说明生活。这使他的艺术理论不可能达到完全科学的水平。他说：“任何东西，凡是人在那里面看得见如他所理解的那种生活的，在他看来就就是美的。美的事物，就是使人想起生活的事物”。试问，人，什么人呢？生活不是完全证明，自从人类分成不同阶级以来，人不是各式各样的吗？另外，人们对生活的理解，不同样是千差万别的吗？一位外国作家曾经发现，同一个民族里边的两个阶级的人，好像生活在两个不同国度里的国民，毫无共同生活与语言。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生活、对美的解释，碰到了这样一个逾越不过去的难关。

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的时代大体相同的法国艺术批评家丹纳，曾经提出了著名的批评三原则，强调种族、时代、环境对艺术的决定作用。丹纳认为，

艺术家的精神面貌和他的作品的面貌，都取决于环境和时代，而最终取决于种族的特点。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他在《巴尔扎克论》这篇论文一开始，说了一些十分出色的话：

精神著作的产生不就只靠精神。整个人对它的产生做出了贡献，他的性格、他的教育、他的生活、他的过去和现在、他的情欲、才能、德行和恶习、他灵魂和行为的每一部分都在他所思考的和写作的东西上留下了烙印。为理解和评判巴尔扎克，我们必须知道他的性格和生活。这两方面都曾给他的小说以营养，它们像两股营养液，给我们就要描述的这枝带病的、奇异而又伟丽的鲜花染上了各种色彩。

打开这篇论文，我们马上就被这段漂亮的开场白吸引住，迫不及待地要读下去，想看看作者是怎样来说明巴尔扎克的“性格和生活”对他的作品打上了烙印。然而，读到最后，一方面不能不感谢作者为我们介绍了巴尔扎克这个“负了债的买卖人”一生所遭遇的困扰和煎逼，他的“像一股浆液泛滥出来的”、过分充足的“气质”，以及他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人欲横流、尔虞我诈的巴黎社会。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感到失望——作者并没有从巴尔扎克的生活和他所处的时代当中，挖掘出真正本质的东西，并没有指出，究竟是什么客观原因，促使法国社会出现了如此荒唐的局面，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古老的法国文坛上，突然开出了巴尔扎克这样一枝带病的、奇异而又伟丽的鲜花。对这些读者急于了解的问题，作者都没有回答。隔靴搔痒，雾里观花，读完全文，留下了这么一种印象。

同样，在《艺术哲学》里，丹纳不止一次强调了“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括”，对研究艺术作品的重要意义。然而，在他的详细叙述中，我们发现他只着眼于一个时代的地域风光、人种特点、社会习尚等等，而从来不去注意对于时代来讲，更具有决定意义的那些领域——经济状况、政治状况。还不仅如此，当他有意无意地说明他对于时代的理解时，一下子暴露了他原来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历史唯心论者。是什么决定了时代的面貌和它的变化呢？丹纳认为是种族的本性，即不同人种的特殊本性。是什么决定了巴尔扎克的作品的特点

呢？丹纳认为是他的特殊的气质。

读到这里，就可以弄清丹纳艺术理论的循环圈了：艺术的特点是时代和环境的特点决定的，时代和环境的特点是人种的本性决定的，因而，艺术的特点最终是人种的本性决定的。看头一个命题，丹纳好像是一个唯物论者，整个来看，他确确实实是一个唯心论者。事情就是这么复杂。

丹纳认为环境、对代对艺术有决定作用，他由此出发，在研究艺术史的时候，注意对一个时代的习俗、风气等现象的调查了解，在这方面搜集了许多感性材料，尽管它们是表面性的东西，但总还是有一定认识价值的。据此，应该肯定他有一定的贡献。另一方面，丹纳又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历史唯心论者，这决定了他不可能取得重大的研究成果。世界观、方法论（尤其是其中对“生活”的认识），在艺术研究中具有明显的指导意义，丹纳的例子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

近来，国内谈比较美学、比较文学史、比较艺术史的文章，出现了好几篇。看来，通过比较的方法（中外的比较，古今的比较）来研究艺术和艺术理论，可以取得更明显的积极成果，这一点已经为不少同志所认识。从我们在上面所进行的比较中，也可以体会使用这种方法带来的好处。下面，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来同古代理论家的认识比较一下，这可以加深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

承认存在决定意识，这是古今唯物论者的共同观点，作为一种同唯心论相对立的思想，无疑地，它符合实际。但是，同样是唯物论者，但对“存在”做何解，尤其是对“社会存在”做何解，这又是一个影响到能否把唯物论贯彻到底的关键问题。古代许多唯物论者，在研究人的意识与自然界关系的时候，承认存在决定意识，但往往在研究人的意识与社会的关系时，滑到了唯心论泥坑。这里的关键，是他们对社会存在的理解（亦即普列汉诺夫所说的关于生活的学说）不正确。比如刘勰，他在《文心雕龙》的《物色》里，探讨创作与自然界外物的关系，提出“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的正确观点，但他在《时序》里探讨创作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时，正如上面所分析的，表现了他的局限性，不能把唯物主义思想贯彻到底。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车尔尼雪夫斯基身上。由此可见，对“社会存在”做何解，对于文艺理论来说，实为一关键问题。

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的革命性贡献，不在于它坚持存在决定意识的一般唯物论见解，而在于它把这种见解，完全、彻底地运用于社会领域，从而提出了唯物史观，使得一切社会科学都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文艺学当然也不例外。

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界中一切现象都有物质原因作基础，同样，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由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① 认为人类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特地把经济领域划分出来，认为它在实际上支配着社会的其他领域，因而在研究这些领域中的社会现象时，首先要把它们“同经济、生产关系体系，以及在一切实抗性社会关系基础上所形成的各个阶级的利益加以对照”。^② 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和要求。

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思想和要求，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彻底地、科学地解释了文艺与现实的关系。关于这一关系的那一系列众所周知的公式，这里不再重复了。

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领域对文艺的最后决定作用。但同时承认政治、法律和其他各种意识形态，对文艺也有重大影响。由于这种情况，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文艺现象时，不忽视政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作用。关于这一点，普列汉诺夫另外有一段话，讲得十分精彩。他说：

要了解某一国家的科学思想史或艺术思想史，只知道它的经济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从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引者注：在稍后一些的地方，作者指出：社会心理是指“社会意识状况”），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因此社会心理学异常重要。甚至在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历史中都必须估计到它，而在文学、艺术、哲学等学科的历史中，如果没有它，就一步也动不得。

（见《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① 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② 《列宁选集》卷一，81页。

普列汉诺夫的这个意见，应该引起我们重视。解放以来，我们编写了一些文学史、小说史，普遍注意运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来研究文学发展的规律，取得了超越前人的重大成绩。但是，总的看来，这些著作对各个时代的社会意识状况、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不够细致、深入，因而，对有些文学现象的解释有简单化的毛病。

比如，有一部小说史，对于《金瓶梅》的评论，只是大骂作者，说他“对野兽般的色情生活的描写，不是批判、憎恶，而是艳羡、欣赏、渲染”，指责作者具有“反动的封建立场，腐朽的思想，低级肮脏的趣味”，除此以外，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实际上，这是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的。试问，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何以会出现这部“时涉隐曲，猥亵者多”的被人目为淫书的小说呢？对这种现象，单凭义愤是解释不清的。

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对《金瓶梅》的分析、评论，有独到之处，它不是一味谩骂，而是凭借对明朝的世情、时尚、世俗的详细研究，指出《金瓶梅》是这个时代社会心理的合乎规律的产物，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在当时最高统治者的提倡。鲁迅在这部小说史里，详细介绍了这部小说问世时的社会心理状况：明朝成化年间（相当于明的中期），由于最高统治集团的堕落生活需要，方士、和尚以献房中术而骤贵。百年后，至嘉靖年间，情形更甚。于是，颓败之风渐及士林，一些原来以进士出身的文人，也不顾所谓廉耻，以献奇方而升官发财。从此以后，“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帷方药之事为耻。风气既变，并及文林，故自方士进用以来，方药盛，妖心兴，而小说亦多神魔之谈，且每叙床第之事也”。鲁迅先生没有明确说明，这种社会风气、社会心理的出现，是中国地主阶级没落期必然出现的腐败现象，但他以详细的材料描述了这种现象，并指出《金瓶梅》是它的产物，这却是十分深刻的。这应该是对我们的一个启示：不注意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是不行的。

再比如，《中国小说史略》对宗教给予小说的影响，有比较详细的研究，而解放后编写的一些文学史著作，在这方面却存在着明显的空白点。鲁迅先生指出：中国本来就信奉“巫”，秦汉以后，神仙之说又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正在这时，印度佛教也传入中国，并渐渐流传广泛。所有这些，都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所以，自晋迄隋，中国特多鬼神志怪小说。宋、元两代，都崇奉道